
劳动力匹配、收入分配与资本主义 积累的社会结构稳定性

杨小忠 丁晓钦*

内容提要 资本主义积累的社会结构(SSA)演进应以劳资关系为研究核心。本文回归到马克思经典理论,用剩余价值率作为判断 SSA 稳定与否的标准,在劳动力匹配模型下分析收入分配、剩余价值率与 SSA 之间的内在关系。本文发现,长期来看,资本主义 SSA 都是不稳定的,资本主义灭亡的命运不会因 SSA 能缓解资本积累和经济萧条而改变。这主要是因为资本主义对社会福利的损害是以减少岗位、降低工人分配比例和工资为代价的,要提升资本主义的产出,须增强工人组织能力和采取集体工资的谈判方式,而这又危及资本主义体系稳定。因此,SSA 的不稳定来自资本主义制度对抗性劳资关系的不可调和,根源于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

关键词 劳动力匹配 积累的社会结构 剩余价值率 资本有机构成

资本主义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工业生产和技术突飞猛进的社会形态,其发展是借由一个能够保证资本积累最大化的平稳生产过程。这需要一系列的社会制度和经济体制作为保障,包括积累的当事人结构(如企业结构)、动力结构(如企业竞争结构和阶级斗争结构)、必备支持结构(如生产和销售过程中的自然资源供给体系、经营管理结构、劳动力保障制度)以及系统性结构(如国家结构和市场经济制度)。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Social Structures of Accumulation, SSA)就是确保资本家能实行资本积累

* 杨小忠(通讯作者):南京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文苑路3号 210046 电子信箱:youngxiaozhong@126.com;丁晓钦: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电子信箱:hpjix@vip.163.com。

作者感谢上海财经大学赵治成的帮助和匿名审稿人的宝贵意见,文责自负。

最大化的一系列制度的综合体(Gordon 等,1982)。这些制度与当时的生产力一致,会促进经济在一个长周期内快速和稳定发展;当制度与生产力脱节时,就会导致经济衰退和 SSA 崩溃,并被新的 SSA 替代。这就提出了本文的研究问题:如今资本主义 SSA 方兴未艾,它以怎样的社会损失为代价?长期来看,SSA 是不是总能调整资本主义危机,使资本主义实现下一期繁荣?它与马克思所述的“资本主义必然灭亡”有没有矛盾?如果资本主义 SSA 最终崩溃,衡量其崩溃的标准是什么?

一 SSA 稳定性标准的提出

SSA 的核心概念既然来自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阶级冲突论,那么 SSA 的研究也应以劳资关系为核心(Reich 等,1997)。劳资关系是阶级力量对比和产品分配的反射,如果资本力量占统治地位,那么工人名义工资的增长就会低于生产率的进步,实际工资的下降不足以支撑与生产相匹配的消费,SSA 不稳定(O'Hara,2003)。如果工人力量超过资本力量,工人过高的工资要求将对企业的利润产生挤压,也会造成 SSA 的崩溃(Bowles 等,1986)。一个典型案例是:一些国家过高的社会福利降低了工人失业时的成本,工人工作的积极性和资本家的投资动机随之下降(Lippit,2010)。20 世纪 80 年代后出现新自由主义 SSA,劳资关系不再是战后那种“稳定中的冲突”,而是以雇主占统治地位和去工会化为特征,但并没有改变从劳资关系的角度对 SSA 稳定性的考察(Keaney,2014)。从生产领域看,如果把资本家和工人当成有限信息下最大化自身利益的两类物种,经济周期中的劳动修复会通过资本修复和资本利得的传导机制,影响资本家与工人和谐共处的条件,经济发展本身也会突破这个边界,资本主义繁荣本身便是危机的根源(丁晓钦和杨小忠,2016);从金融领域看,只有对较高投机利润乘数的市场加以管制,保障工人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不被挤占,才能保证 SSA 的稳定(丁晓钦和鲁春义,2014)。由于资本积累和社会制度之间存在互动作用,以劳资关系为 SSA 研究的出发点,可以抓住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核心,是研究资本主义危机的关键(Gordon 等,1994)。

劳资关系是研究 SSA 稳定性的出发点,但是否用一个统一的标准衡量 SSA 的稳定性,学者们的意见并不相同。Kotz 等(1994)认为,SSA 是多元紧密相关的复杂矛盾体,任何一个组成结构的变化都会在整个中引起连锁动荡,完整的结构才是 SSA 稳定与否的关键,包括劳资和谐、强权政治以及市场竞争和金融环境。Gordon(1980)则认为将 SSA 稳定性置于一个统一的标准下研究值得商榷,因为国家的社会结构具有历史偶然性,经济危机的外生冲击在各国也不同,这种偶然性和 SSA 结构的多元性构成

支撑经济发展的制度是一个有机体,SSA 只具有国家之间的独特性而没有核心因素。SSA 的稳定与崩溃是特定体制和与之相关的体制在外生事件冲突下相互作用的结果,是多元决定的过程(Resnick 和 Wolff,1988;Keaney,2014)。

Resnick 和 Wolff(1988)、Lippit(2010)以及 Klitgaard 和 Krall(2012)虽然没有明确提出衡量 SSA 稳定性的标准,但他们都自然地将 SSA 的稳定性和利润率的讨论结合在一起。SSA 的功能在于通过制度安排稳定资本家的利润率或预期利润率,为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提供制度支持。战后(从二战结束到 20 世纪 80 年代)美国 SSA 的巩固在于其提高了资本实力,而资本实力就是获取利润。只有获取利润,资产阶级的实力才会超过其他社会主体,才能构成资本积累的基本条件(马丁等,2004)。战后资本主义 SSA 的崩溃在于平均利润率下降和劳动成本上升导致的“利润缩减”危机(马艳和严金强,2015)。20 世纪 80 年代后新自由主义 SSA 兴盛,是因为它确保了资本获得较高的利润率,而不在于其对经济增长速度的作用(Wolfson 和 Kotz,2010)。利润率在资本价值转化为成本价格、剩余价值向利润的转化过程中形成,需要市场竞争机制将社会劳动在各个部门间分配,并允许资本自由流动以实现利润率的平均化。可见,利润率囊括了影响预付资本、劳资关系、市场机制及要素流动的各种因素,是一个综合作用的复杂体。Lippit(2010)认为战后 SSA 的利润率是下面几个因素合力的结果:劳资妥协、良好的投资环境、企业对社会保障的建设、公民对企业经营的较少干预以及资本之间有限竞争。因此,利润率是复杂社会系统作用的结果,其作为 SSA 的衡量标准具有优越性。

利润率衡量 SSA 稳定性标准的优点也正是其缺点:利润率的作用因素如此之多,在政治经济学计量检验方法不成熟的今天(马艳和严金强,2015),什么因素才对 SSA 稳定或崩溃起主导作用?另外,利润和剩余价值虽然都是商品价值超过成本价格的余额,但本质上却掩盖了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之间的区别,错误以为剩余价值是由总资本而不是可变资本引起的。受市场竞争影响,量上也可能出现利润和剩余价值不等的情况(洪银兴,2005)。

学者们对 SSA 的稳定性研究虽然颇有争议,但他们毫无例外地将焦点集中在劳资关系上。本文认为,剩余价值率是一段时期内剩余价值量和可变资本的比率,表明价值的创造源泉及其在劳资间的分配,最能体现劳资的对抗性关系。我们利用 1960-2016 年美国经济分析局的数据,将经过存货和资本消费调整过的企业家收入、租金收入及资产性收入(如利息和红利)之和作为资本家所得,将工人工资、奖金以及通过政府福利、社会保险、医疗保险或失业保险等转移给工人的账户(Personal Current Transfer Receipts)视为劳动者所得,计算出剩余价值率(用 m' 表示)。如图 1 所示,剩余价

值率的最低点分别对应了 20 世纪 70 年代的石油危机、1992 年的美国银行倒闭危机、2000 年美国网络科技泡沫危机和 2008 年的全球性金融危机,这 4 次危机都发生在旧 SSA 不稳定时。因此,SSA 的动荡都发生在剩余价值率的低点,用剩余价值率作为衡量 SSA 是否稳定的标准具有现实意义。

另外体现劳资力量对比的两个变量,一个是工人失业后得到的福利(用 b 表示,单位为 10 亿美元),这是工人展开长期斗争的结果,用工人转移账户来衡量;另一个是资本家一旦雇佣不到工人,岗位空缺下资本产生的闲置成本(用 k 表示,单位为 10 亿美元),这显示了经济活动中工人的重要性,用资本的租金收入和资产性收入来衡量。图 1 右纵轴表示两者的度量,可以发现两者在长周期内和剩余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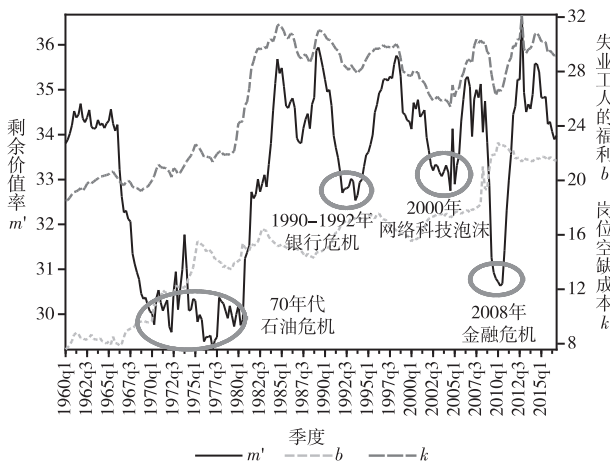


图 1 剩余价值率与美国 SSA 的稳定性
数据来源: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数据整理得出。

率的变动趋势相同, k 的低点和 b 的高点也能预测 20 世纪 80 年代后 SSA 某些时刻的不稳定性。但它们并不能预测 80 年代前的 SSA,并且时点上还存有时滞。这是因为劳资的政治和经济力量对比共同促进了剩余价值率,两种力量会互相作用,提早或滞后 SSA 的不稳定点。因此,将剩余价值率作为 SSA 稳定性衡量的标准更具有科学的意义。

剩余价值率作为 SSA 稳定性衡量的标准,同样具有理论意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建立在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和资本家对雇佣劳动者剥削的基础上。资本家采取种种手段提高剩余价值率,如果剩余价值率下降,这种生产关系就处于失灵状态。这主要有两层含义:第一,SSA 作为“积累机制”和“调节模式”的综合物,需要各种薪酬关系的构造和竞争组织形式等机制作为支撑,才能形成价值分配与生产可能性一致的社会需求有机构成(Boyer, 1990; McDonough 等, 2010)。SSA 通过分析资本积累进程和对这一进程起调节作用的关系来解释资本积累的长期模式,一旦体制适合这种资本积累模式,它就会得到发展,否则 SSA 就会出现结构危机。所以,判断 SSA 稳定与否应该以最大化资本积累为出发点,而剩余价值是资本积累的来源,如果扩大再生产的资本来源——剩余价值枯竭,资本主义就不能延续。从而,追求资本积累最大化的 SSA 须

建立稳定的劳资关系以使工人持续和最大化提供剩余价值。第二,马克思经典理论中,剩余价值率揭示的劳动创造出来的价值在两大阶级间的分配是劳资关系的核心,它表示的预付可变资本增殖速度反映了资本主义的剥削程度。资本家对工人剥削程度越高,越有利于资本积累,而剥削程度过高,又会引发社会有效需求不足和生产相对过剩危机,反而阻碍了资本家资本积累最大化的实现。因此,剩余价值率上升到一定水平后会快速和急剧下降,此时剩余价值率的下降,并不是实际工资得到了增长,而是因为生产率的崩溃。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剩余价值率作为 SSA 稳定性衡量标准具有现实支撑和理论意义。我们回归到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劳资关系的核心上,假设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都能得到价值补偿和实物补偿(此时资本主义危机的传导机制不再是社会有效需求不足和生产相对过剩),而把注意力集中在生产过程中对抗性劳资关系上,探讨资本家对资本积累的追求是否会引发劳资冲突,进而导致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崩溃。因为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追求会导致劳资分配不均,引发工人群众运动,而生产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又会迫使资本家加强对工人的监督,这些都使资本家的产出发生损失,影响剩余价值的实现和 SSA 的稳定性。因此,本文是对有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资本主义危机来源研究的补充。

本文从生产过程中的劳资关系入手,建立了包括收入分配、劳动力市场及劳资对抗在内的一般均衡模型,界定了 SSA 稳定的内在条件。这对资本主义体系是否有自我调节机制以缓解危机会有更深的理解,也对理解工人运动和资本主义国家的福利制度提供了参考。

本文余下结构安排为:第二部分设定模型;第三部分分析 SSA 下的劳动力市场、劳资分配及资本家对工人的监督机制;第四部分以剩余价值率为衡量 SSA 稳定性的标准,讨论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第五部分分析资本主义 SSA 造成的社会福利损失;第六部分用美国数据对模型进行检验;最后为本文结论。

二 模型设定

企业和工人在匹配过程中往往存在资源消耗和信息不对称,产生市场摩擦,从而稳态中失业始终存在。劳动力匹配模型能够刻画这种信息不对称,并纳入生产过程劳资冲突及其对宏观经济的均衡影响,此时岗位和就业工人的均衡数量内生于资本积累的最大化动机,失业不再局限于信息不对称产生的摩擦性失业,企业还可能在追逐剩

余价值时有意减少劳动岗位的供给。这与马克思关于资本积累和过剩人口的论断一致:在资本积累动机和剩余价值规律的支配下,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资本家会用资本代替劳动,减少对劳动者的岗位供给,产生劳动人口相对过剩和资本主义失业危机。劳动力匹配模型达到均衡时,失业并不会消除。失业产生产业后备军,这既是适应资本扩张和收缩的需要,也有利于资本家加强对工人的剥削。“这种过剩人口反过来又成为资本主义积累的杠杆,甚至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的一个条件”^①。因此,劳动力匹配模型结合马克思主义失业理论,具有一定的说服力。此外,劳动力匹配模型可以抽象流通领域,假设产品需求自动满足供给,以利于假设产品市场均衡而将研究集中在生产领域以及劳资对抗对生产和就业的影响上,这也是本文用劳动力匹配模型作为研究基准的理由之一。

社会总价值在工人和资本家之间分配的来源:一是事先通过谈判确定社会总产出在两者之间的分配比例,这取决于工人联盟的程度和工人-资本家的力量对比,我们用 f 表示工人所占社会总价值的比例,资本家份额则为 $1-f$;二是劳资分配来源于劳动力市场的经济关系,即寻找工作的劳动者数量与厂商提供空缺岗位数量之间的对比。用空缺岗位(v)和失业工人(u)的比率($\theta = v/u$)表示劳动力市场的紧性(tightness), $\theta < 1$ 表示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不利于工人实际工资上升, $\theta > 1$ 表明劳动力市场供不应求。失业工人和空缺岗位对彼此的需求形成劳动力市场的搜寻,匹配函数是 u, v 的数学表达 $M(u, v)$,关于 u, v 递增、凹且一阶齐次。一定时期内空缺岗位匹配到工人的概率 $q(\theta) = M(u, v)/v$,失业工人找到新工作的概率 $p(\theta) = M(u, v)/u$ 。显然 $p(\theta) = \theta q(\theta)$,且一阶导数 $q'(\theta) < 0, p'(\theta) > 0$,表明劳动力市场上失业工人相对于空缺岗位的数目越多,空缺岗位匹配到工人的概率就越高,而工人找到工作的概率越低(Pissarides, 1985)。为便于计算,假设 $M(u, v) = u^\alpha v^{1-\alpha}$, α 为介于0和1之间的数值。

在一个生产性模型中,没有产品市场和消费市场,所有产出都有相应的需求与之对应。产品价值可以用产品数量衡量,工人失业后得到的福利(b)理解为失业后工人能获得多少产品,岗位闲置时的成本(k)理解为厂商亏损了多少产品。换一种角度,当价格自动实现(假设为单位1),产品数量是劳动时间投入的函数,价值取决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因此,可以实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价值概念在劳动力匹配模型下的融合,并将单位折算成一个统一的度量。这样,工人失业或就业、岗位有人或无人工作的不同状态也有“价值”:得到或失去多少产品数量(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用

^① 马克思(1975,中译本):《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692页。

U 和 E 分别表示工人失业状态和工作状态时的价值, J 和 V 表示岗位上有工人工作和岗位闲置时的价值。为了匹配, 工人得到了 E 而放弃了 U , 将 $E - U$ 定义为工人匹配价值, 同理 $J - V$ 为岗位匹配价值, 社会总价值为两部分之和。工人匹配价值为:

$$E - U = f(E - U + J - V) \quad (1)$$

岗位和工人结合时, 工人以 w 的工资生产出 y 的产值。正在运行的岗位可能由于真实的需求结构或技术变化形成冲击, 造成岗位不再需要工人或者工人离职, 这种岗位 - 工人分离的概率为 s 。用 r 表示利率, 岗位空缺和有人工作时, 分别有:

$$rV = -k + q(J - V), \quad rJ = y - w - C + s(V - J) \quad (2)$$

其中, C 是资本家生产过程中的损失函数, 体现了劳资关系对抗造成的损失。首先, 它与分配比例有关, 分配给工人的比例越低, 工人罢工的意愿和谈判的成本越高, 产出损失越多 (Freeman 和 Medoff, 1984)。虽然资本势力能决定剩余价值的分配, 但工人对这种分配的抵制会导致资本家产生损失, 恰当的分配系数才能有利于 SSA 的稳定 (丁晓钦和鲁春义, 2014)。其次, 生产活动中存在信息不对称, 资本家希望工人在生产中付出努力, 这需要资本家监督工人, 而监督本身需要成本, 从而产生资本家损失的第二个来源。用 ϕ 表示资本家监督力度, 损失函数为:

$$C(f, \phi) = (1 - \gamma)\phi^{1+\eta}/(1 + \eta) + \gamma\pi f^{-\rho} \quad (3)$$

其中, η 为 ϕ 相对于成本函数弹性的倒数, π, ρ 是数值为正的系数。资本家的产出损失是工人社会总产值分配比例 (f) 的减函数, γ 表示来源于这部分损失的比重, 取决于工人联盟和工会化组织程度、以工会等集体形式的工资谈判方式等, 体现了劳资双方对工人分配比例的重视程度; 资本家的损失同时也是资本家监督力度 (ϕ) 的增函数, $1 - \gamma$ 为产出损失来自这部分的比重。

资本家一旦发现工人偷懒, 直接予以开除, 而工人努力需要付出体力和脑力劳动, 假设 1 单位的努力程度需要付出 1 单位的体力脑力成本, 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衡量。资本家意识到, 为了达到他所期望的工人努力程度 (e), 等价于面对两类不同状况的工人: 一种工人没有努力工作, 需要加强监督; 另一种工人努力工作, 资本家不予监督。用 E^n 表示工人消极怠工时的价值, E 表示工人工作努力时的价值, 存在:

$$rE^n = w + (s + \phi)(U - E^n), \quad rE = w - e + s(U - E) \quad (4)$$

资本家希望通过调整监督力度 (ϕ) 得到努力工作的工人。要使 $E \geq E^n$, 并且由于监督会对资本家产生成本, ϕ 有两种表达式:

$$\phi = \frac{(r + s)(E - E^n) + e}{E^n - U}, \quad \phi = \frac{(r + s)e}{w - rU - e} \quad (5)$$

这说明,如果工人失业后可以很快找到工作以及失业后的社会保障更好或岗位-工人分离的概率更大,资本家监管力度就会加强。

工人失业后,可以获得社会保险等各种福利,用 b 表示,存在:

$$rU = b + p(E - U) \quad (6)$$

将方程(2)(4)(6)代入方程(1),可得工资的构成:

$$w = f(y - C + k) + (1 - f)(b + e) + p(1 - f)(E - U) - fq(J - V) \quad (7)$$

工资由3部分构成:如果工人就业,拥有岗位所生产的净收益中 f 部分;如果工人失业,却能获得社会保障收益中的 $1 - f$ 部分;扣除状态变化时放弃的那部分价值。

利用方程(2)(4)(6)计算方程(7)中的岗位匹配价值和工人匹配价值:

$$J - V = \frac{y - w + k - C}{r + s + q}, \quad E - U = \frac{w - e - b}{r + s + p} \quad (8)$$

将方程(8)代入方程(7),得到工资的具体形式:

$$w = \frac{f(r + s + p)(y - C + k) + (1 - f)(r + s + q)(b + e)}{f(r + s + p) + (1 - f)(r + s + q)} \quad (9)$$

当 $f = 1/2, p = q$, 即社会分配绝对平均时,社会总财富由工人和资本家平分,工资绝对公平, $w = (y - C + k + b + e)/2$; 当 $p = q, w = f(y - C + k) + (1 - f)(b + e)$ 时,工资取决于收入分配中的比例。当 $f = 1/2, p \neq q$ 时,劳动力市场是决定工资的主要因素:如果劳动力市场对工人不利、失业工人不容易找到工作, $p < q$, 此时工人只能获得很少的工资, $w < (y - C + k + b + e)/2$; 如果劳动力市场对工人有利, $p > q$, 那么工人获得较多工资。

没有人工作时,岗位不创造价值, $V = 0$ 。由方程(1)(2)和(8)得到工资的另一个表达式:

$$w = \frac{f}{1 - f} \frac{(r + s + p)k}{q} + b + e \quad (10)$$

通过方程(9)和(10),得出 f, ϕ 与 θ 的关系:

$$k[r + s + fp(\theta)] = q(\theta)(1 - f)(y - C - b - e) \quad (11)$$

将方程(10)代入(5),并由方程(8)和(6)解出 rU , 得到 ϕ 的表达式:

$$\phi = eq(1 - f)/(fk) \quad (12)$$

劳动力市场均衡时,工人被解雇的数量等于空缺岗位匹配到失业工人的数量。稳态时的失业率符合:

$$s(1 - u) = qv = \theta q(\theta)u \quad (13)$$

均衡时的失业包括信息不对称导致的结构性失业,但不管是工人-岗位的匹配,还是生产过程中工人努力程度(e),信息不对称都属于模型的外生因素。资本积累最

大化的动机,还可能内生于模型的另一种失业:在总劳动人口绝对数量增长(或不变)的情况下,资本家倾向于减少空缺岗位的供给,降低对劳动的需求,造成劳动人口数量相对过剩。这就是马克思相对过剩人口的失业理论。为此,考虑稳态时的就业人数,假设社会总劳动力人数为单位1,就业人数为:

$$l = \frac{\theta q(\theta)}{s + \theta q(\theta)} \quad (14)$$

$l < 1$ 显然成立,稳态时失业持续存在。产出(y)是工人努力程度(e)和劳动投入(l)的增函数 $y(e, l)$, 假设努力程度(e)的工人生产效率为 e^τ , β 为劳动的产出弹性,则产出函数为:

$$y(e, l) = (e^\tau l)^\beta \quad (15)$$

其中, τ 为大于0的参数。均衡时,岗位数量既不增加也不减少,工资 $w = y - C - (r + s)J$, 确保了资本家预期意义上的收支平衡:产出剔除劳资对抗的损失和岗位本身的成本,正好以工资形式补贴给工人。剩余价值由就业工人和岗位匹配时创造,为 $y - C - w$, 即 $(r + s)J$ 。

可见,劳动力匹配模型虽然源于西方经济学的语境,但研究内容并没有脱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范畴。 k 是资本闲置的损失,资本闲置时,一部分固定资本将不执行资本职能,导致混乱和损失,“平衡都是由于一个或大或小的资本被闲置下来,甚至被毁灭而得到恢复”^①“周期将重新通过。由于职能停滞而贬值的一部分资本,将重新获得它原有的价值”^②。 s 是岗位针对性冲击造成的岗位-工人分离概率,可以是真实的需求结构性变化或者技术变化,而按照马克思主义的人口理论,工人的变化不能离开物质生产和生产方式去研究,人口是“全部社会生产行为的基础和主体”^③。资本主义不断积累资本,导致劳动力相对不变资本相对过剩,岗位可能消亡或需要很少的工人。因此,工人的增加实际上是“通过使一部分工人不断地被‘游离’出来的简单过程……现代工业的整个运动形式来源于一部分工人人口不断地转化为失业的或半失业的人手”^④。

三 SSA 理论下的收入分配

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方占统治地位,假设工人占社会总价值的比例(f)完全由资本

① 马克思(1975,中译本):《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282-283页。

② 马克思(1975,中译本):《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284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1972,中译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102页。

④ 马克思(1975,中译本):《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694页。

家决定。资本家提供岗位的目的是希望尽量占有工人-岗位匹配成功后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但他们须考虑劳资对抗对工人工作态度和生产效率的影响。假设岗位空缺时的价值 $V=0$,代入方程(2),得到 $J=k/q$,再利用劳动力市场均衡时的工资、方程(2)与(8),得到资本家的最优化问题:

$$\max_f (J - V)$$

由于 $J - V = (1 - f)(E - U + J - V)$,将均衡时的 $w = y - C - (r + s)J$ 代入由方程(8)构成的 $E - U + J - V$,得到资本家最优化目标的另一种表达式:

$$\max_f (1 - f) \left(\frac{y - C - (r + s)k/q - e - b}{r + s + p} + \frac{(r + s)k/q + k}{r + s + q} \right)$$

根据方程(3), C 是 f 的函数。对 f 求导,一阶最优条件为:

$$y - C - e - b + \theta k = (1 - f)\rho\gamma\pi f^{\rho-1} \quad (16)$$

均衡时,给定岗位和工人特征参数 $\{b, k, s, \gamma\}$ 、资本家损失参数 $\{\eta, \rho, \pi\}$ 、生产函数 $\{e, \tau, \beta\}$ 及利率 (r) ,存在一组变量 $\{f, \phi, \theta\}$ 符合方程(11)(12)和(16),就业率 (l) 、产出 (y) 、工资 (w) 和劳资对抗产生的损失 (C) 均内生于 $\{f, \phi, \theta\}$ 。

图2为各个变量变动时 f, ϕ 及 θ 的数值模拟,左边纵轴表示 f 和 ϕ ,右边纵轴表示 θ 。左上图显示工人失业后的福利 (b) 增加时,就业与不就业之间的收入差距缩小,工人更愿意等待工资更高、与自己能力更匹配的工作,公司为吸引工人就业,会提供更多和更好的工作岗位, θ 上升 (Acemoglu, 2001)。失业时的福利增大,工人工作不努力被辞退的后果就不那么严重,资本家要使工人努力工作,会加强监督, ϕ 增加,与之相对应,资本家通过降低工人所得比重 (f) 以增加自身收入。

图2右上图显示,当岗位空缺闲置成本 (k) 增大时,厂商一方面会尽量减少这种岗位供给,造成 θ 下降,另一方面会降低监督的概率以避免工人离职, ϕ 下降。此时工人消极怠工造成的损失让位于岗位的闲置成本,资本家分配给工人的比例 (f) 下降。资本主义由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转移时,资本家加大资本和设备投入,客观上使岗位一旦空缺下来,成本也随之增加。对应这种情况,“劳动生产力提高时……同剩余价值比较起来,劳动力的价值还是不断下降,从而工人和资本家的生活状况之间的鸿沟越来越深”^①,即工人占社会总价值的比例 (f) 下降。

图2左下图显示,当岗位-工人分离概率 (s) 上升时,工作人员流动性大,资本家不会与工人建立长期稳定的劳动关系。为获取最大剩余价值,其会提高监督力度 (ϕ)

① 马克思(1975,中译本):《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571页。

以增加产出,降低工人所占社会总价值比例(f),同时增加岗位数量以应对高岗位-工人分离概率, θ 上升。

图2右下图显示,当 γ 增加时,企业效率损失主要来源于工人所占社会总价值比例(f),资本家会给工人更多比重,工人有内在动力就业, θ 上升,此时资本家不需要过多监督, ϕ 下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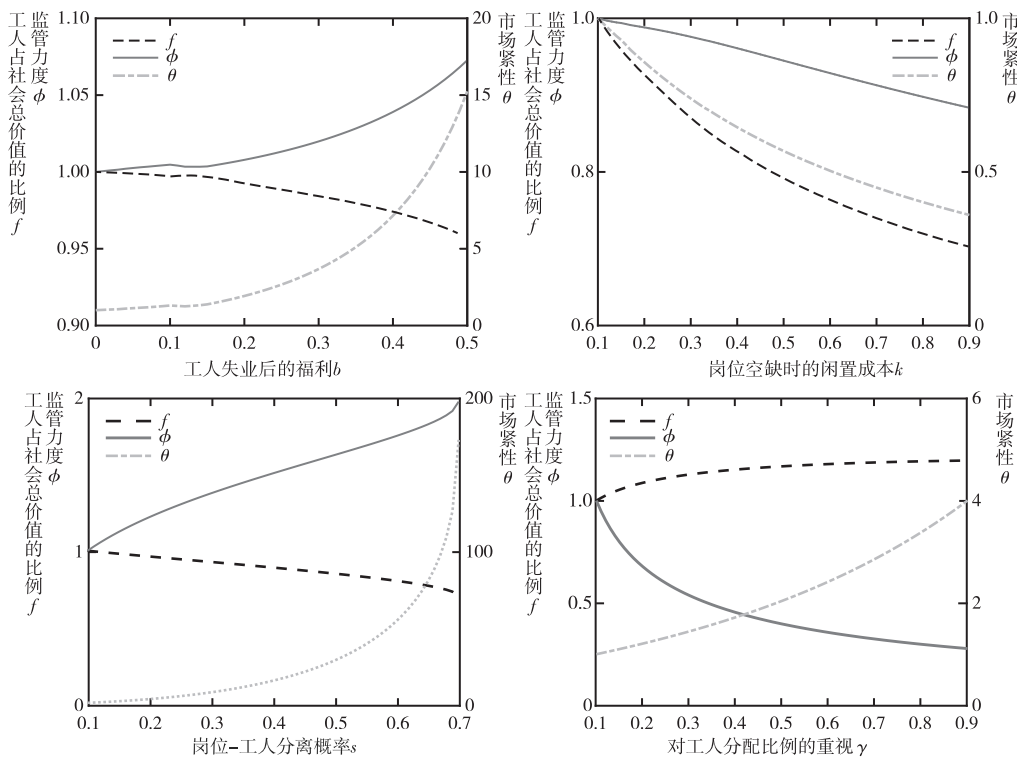


图2 f, ϕ 及 θ 的数值模拟

说明: $r=0.05, e=0.2, \tau=2.0, \beta=0.5, \rho=0.5, \eta=5.0, \pi=0.2$ 。 b 变动时, $k=0.1, s=0.04, \gamma=0.7$; k 变动时, $b=0.1, s=0.04, \gamma=0.7$; s 变动时, $b=0.2, k=0.1, \gamma=0.7$; γ 变动时, $b=0.2, k=0.1, s=0.04$ 。

四 SSA 稳定性标准的检验

当一种 SSA 产生时,较高的剩余价值率和长期增长预期使资本积累得以保证,较高的投资水平也强化了 SSA 的扩张,但是在其扩张过程中,日益激烈的劳资斗争又最终会

破坏剩余价值的积累,使 SSA 崩溃。因此,用剩余价值率作为衡量 SSA 稳定性与否的指标。为简便起见,假设所有剩余价值都用来扩大生产,没有资本折旧,剩余价值率表示为:

$$m' = \frac{y - C - wl}{wl} \quad (17)$$

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阐述了资本有机构成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的作用:资本追逐剩余价值的动机促使资本家不断采用新技术和新设备,提高劳动生产率,造成单位工人一定时间内使用的生产资料数量增加、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和可变资本比重降低。当剩余价值率不变时,资本有机构成升高会导致利润率下降。因此,为了检验剩余价值率作为 SSA 稳定性衡量标准的稳健性,本文用资本有机构成作为第二个检验变量。假设厂商流动资本相对庞大的固定资本非常小,生产强度较低,可以把岗位空缺下资本产生的闲置成本(k)近似看成单位劳动使用的不变资本,则资本有机构成的表达式为:

$$\psi' = k/w \quad (18)$$

将方程(11)(12)及(16)得到的 f 、 ϕ 、 θ 代入方程(3)(10)(14)及(15),得到均衡时的 C 、 w 、 l 和 y ,计算出剩余价值率及资本有机构成。数值模拟如图3所示,两者变动方向一致,说明结果稳健。图3显示,当工人失业福利(b)增加时,工人不担心失业,工作努力程度下降,资本家监督成本增加,最终所获剩余价值减少,SSA 长期看不稳定(Lippit,2010)。当岗位-工人分离概率(s)增加时,就业队伍不稳定,资本家不愿意提供过多的岗位,工人监督成本上升也制约了剩余价值的获取,导致剩余价值率下降。当 γ 增加时,劳资对抗产生的损失更多来自工人分配比例(f),资本家增加 f 以降低产出损失,其剩余价值率下降。在这3种情况下,资本家最大化资本积累的目标都不能实现,SSA 最终崩溃。

保障 SSA 稳定似乎只有一种办法:扩大投资,利用先进设备,密集化使用资本。此时岗位一旦闲置,成本较大。对应图3右下图,当 k 增加时,剩余价值率和资本有机构成升高,SSA 稳定。但根据图2,这会增加失业人口数量和工人分配比例下降——马克思从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入手,认为这种方式不仅“产生永久性的显而易见的工人人口过剩”^①,而且社会消费力“取决于以对抗性的分配关系为基础的消费力。这种分配关系,使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消费缩小到只能在相当狭小的界限以内变动的最低限度”^②,从而社会有效需求不能满足社会总产品的实现,资本主义生产

① 马克思(1975,中译本):《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247页。

② 马克思(1975,中译本):《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272-273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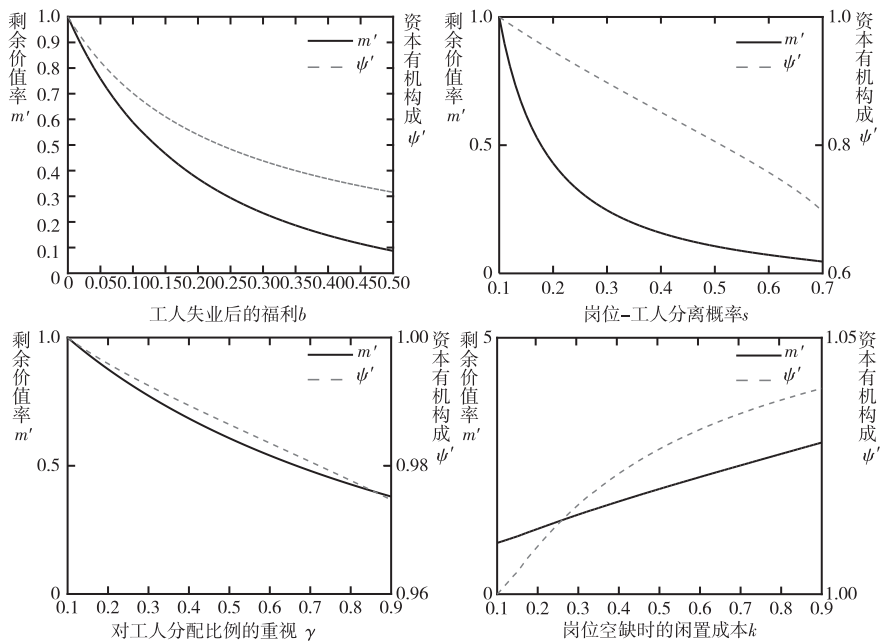


图3 SSA 稳定性及稳健性检验

说明:参数值与图2相同。

出现相对过剩危机。因此《资本论》所述内容是对本模型缺少的产品和消费市场的补充。

综上所述,无论资本主义采用什么方式,SSA 最终都将崩溃,这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深层次原因决定的。这使 SSA 理论实现了一定程度的突破:与传统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的资本主义会陷入永久萧条和停滞不同,SSA 理论虽然也承认工人阶级和资本家之间的矛盾会阻碍资本积累,但认为可以通过建立一套能够缓和与分化阶级矛盾的制度来实现资本的持续积累,如较和谐的劳资关系和福利制度等(McDonough 等,2010)。本文认为,资本主义国家只能采取这几种政策组合以延缓资本主义崩溃的速度,但并不能改变资本主义体系崩溃的趋势。

五 资本主义 SSA 的社会福利分析

SSA 理论解释了资本主义历史中长期、过快的经济增长与异乎寻常、持续时间较长的危机之间互相交替的原因,资本家会选择最有利于剩余价值生产和资本积累的劳

资分配比例,缓和劳资矛盾,激励工人工作,但这要以一定的社会福利损失为代价。为了评价资本主义 SSA 下的社会制度和经济结构,并对比分析资本主义 SSA 下的福利与整体最优社会福利,假设有一个社会计划者,根据整体社会福利最优原则确定分配比例:

$$\max_f (E - U + J - V)$$

由于 $E - U + J - V = (E - U)/f$,将均衡条件下 w 代入方程(8)中的 $E - U$,社会计划者的目标可写为:

$$\max_f \frac{1}{f} \frac{\gamma - C - (r + s)k/q - e - b}{r + s + p}$$

其中 C 是 f 的函数,基于方程(3)从而一阶最优条件为:

$$\gamma - C - (r + s)k/q - e - b = \rho\gamma\pi f^{-p} \quad (19)$$

将资本主义 SSA 下的 $f, \theta, \phi, w, \gamma, m'$ 与由方程(11)(12)和(19)决定的整体社会福利最优时相比,发现两者基本一致,限于篇幅,图4只报告了 s 变动时的情况。图4用实线表示资本主义 SSA,虚线表示社会最优时的情况(对应 *social*)。通过比较实线和虚线的位置,发现相对于整体社会福利最优,资本主义 SSA 下,资本家倾向分配给工人较低的社会总价值比例(f),有意减少岗位供给以创造“相对过剩劳动人口”(θ 过低,通过方程(14)使就业工人数量减少,此时的失业符合马克思相对过剩人口的失业理论)。这有利于资本家压低工人工资的诉求(w 较低),工人不愿提供足够的劳动力,社会生产力也没有得到充分发挥(γ 较低)。为了使低收入的工人努力工作,资本家必须加强对工人生产过程中的监督(ϕ 过高),造成监督成本上升和社会产值的无谓消耗。社会福利损失是为了资本家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率(m' 过高)。因此,资本主义 SSA 下,资本家更像一位垄断者,为了获取最大资本积累,人为限制岗位供应以及扭曲工资价格,造成资源错配和效率损失。资本主义危机通过产生新的垄断 SSA 得以解决,其特点是拥有一个寡头垄断的市场结构、软弱的工会、在拉美和亚洲实行扩张主义以及创立美联储制度(McDonough 等,2010)。

对比图2和4可以发现,资本主义社会要达到整个社会的资源有效配置,就必须使得 f 和 θ 同时增加,而它们又内生于资本家追逐剩余价值和资本积累的动机。资本主义国家只能从 γ 上做文章,即只有当工人对分配比例极为重视、工人斗争可以给资本家的生产造成足够损失时,才可能通过经济各要素的彼此影响,同时提高工人占社会总价值的比例(f)和市场紧性(θ),解决资本主义 SSA 下工人分配比例过少和工资扭曲的状况,增强资本主义 SSA 的社会福利。这是二战后资本主义国家工人组织运

动兴起、战后 SSA 稳定的原因之一,也为马克思主义者历来重视工人运动、提倡工人阶级联合起来以增强劳动者工资议价能力提供了理论基础。另外,允许工人联合自治和释放劳动者的力量是把双刃剑,它虽然提高了资本主义 SSA 下的社会福利,但容易改变劳资力量对比,危害资本主义稳定。换句话说,资本主义繁荣本身导致了资本主义体系的崩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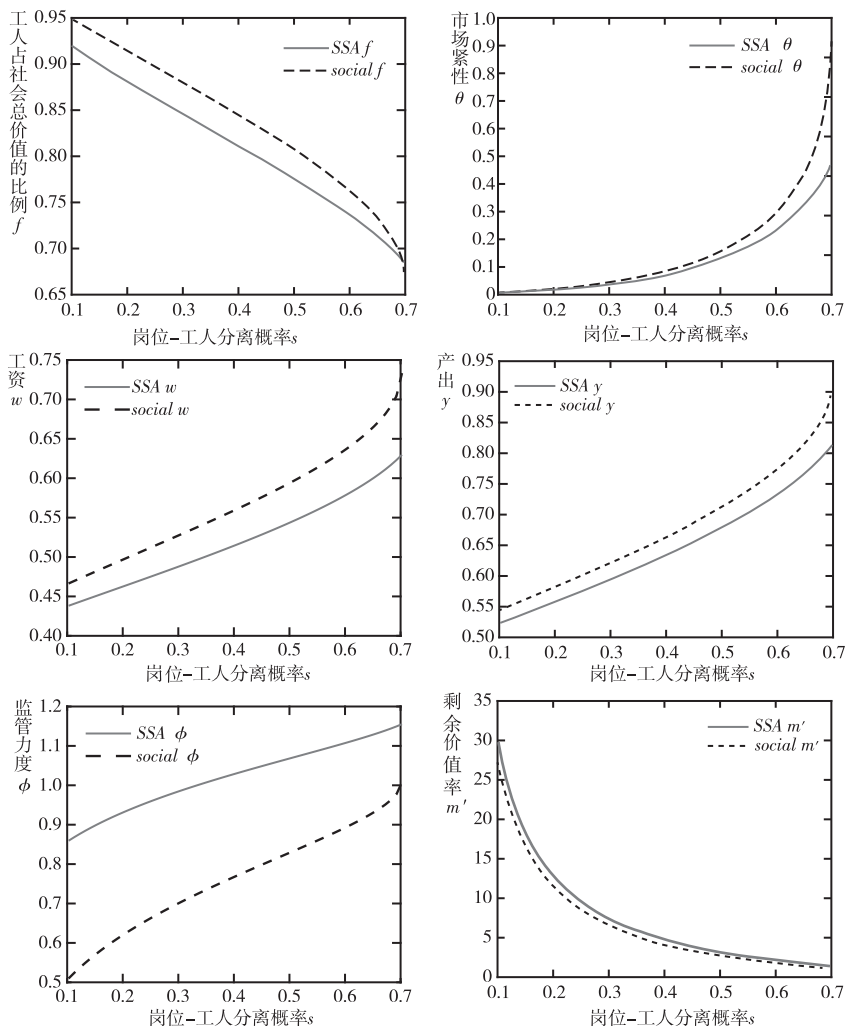


图4 资本主义 SSA 与整体社会福利最优时的比较

说明:参数 $r=0.05, e=0.2, \tau=2.0, \beta=0.5, \rho=0.5, \eta=5.0, \pi=0.2, b=0.2, k=0.1, \gamma=0.7$ 。

六 SSA 衡量标准的美国经验

(一) 事实描述

从图 1 可以看出,1960-1980 年美国的剩余价值率处于下降趋势,1980-2016 年剩余价值率上升很快,并且均值大于 1960-1980 年,表明工人实际工资上涨受到限制。相对于 1960-1980 年,1980-2016 年的资本闲置成本向上跳跃,工人失业后福利的变化趋势和剩余价值率保持一致,这可能是资本积累最多时工人有可能得到各种社会福利所致。用单位产品价格中的非劳动成本与劳动成本的比重作为资本有机构成,从长周期(1947-2016 年)看,美国资本有机构成上升,但技术进步使劳动复杂程度加深,资本承载的机器设备等使用效率增强,资金周转速度加快,不仅单位劳动产出和单位时间产出上升,产品价值和剩余价值率也增加。为了抓住美国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化,采用小波分析方法,考虑时间维度和频率维度捕获资本有机构成的信号瞬变(Sircar, 2013),如图 5 美国资本有机构成序列的功率谱,纵轴为资本有机构成的波动幅度。图中两个高峰对应 20 世纪 70 年代石油危机和 2008 年全球性金融危机,因而不管从图 1 剩余价值率角度还是从图 5 资本有机构成角度看,1980 和 2008 年都是 SSA 发展史上的重要年份,并且它们变动方向一致,符合图 3 所示。

(二) 经验分析

2008 年后数据较短,美国政府对金融管制的加强是否改变新自由主义 SSA 特定制度环境下公司结构、劳资关系、金融、国家和公民关系以及家庭体系 5 个关系,标志新的 SSA 到来还有待考察。因此,为考察剩余价值率 m' 与 b 和 k 的关系,我们将时间分为 1980 年以前和 1980 年以后。为防止伪回归,我们做了各个变量的平稳性检验(结果见表 1),其中 D 表示一阶差分。

1960-2016 年和 1960-1980 年的 m' 、 b 和 k 都是一阶单整,可以通过 Johansen 协整检验判断是否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1980-2016 年的 m' 、 k 平稳, b 一阶单整,上述方法失效,使用 Eviews 9.0 建立自回归分布滞后(ARDL)模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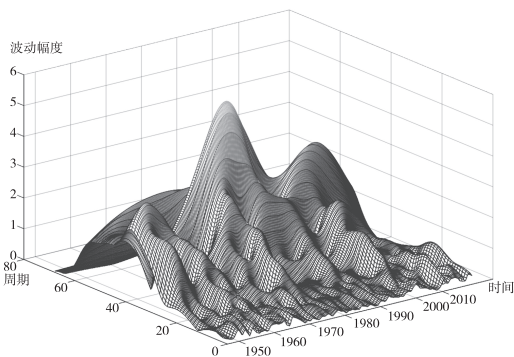


图 5 美国资本有机构成的功率谱

表 1

ADF 单位根检验

	1960-2016 年			1960-1980 年			1980-2016 年		
	t 统计量	p 值	结果	t 统计量	p 值	结果	t 统计量	p 值	结果
m'	-1.7704	0.3946	不平稳	-0.9849	0.7551	不平稳	-3.7704	0.0040	平稳
$D(m')$	-13.7570	0.0000	平稳	-7.7015	0.0000	平稳			
b	-2.8382	0.1852	不平稳	-1.4331	0.8436	不平稳	-3.0736	0.1165	不平稳
$D(b)$	-5.4257	0.0000	平稳	-7.6485	0.0000	平稳	-4.1219	0.0012	平稳
k	-1.6882	0.4359	不平稳	-2.4765	0.3387	不平稳	-3.7659	0.0041	平稳
$D(k)$	-7.8218	0.0000	平稳	-5.6564	0.0000	平稳			

说明: 剩余价值率的影响因素与模型预测一致。鉴于数据的可得性和模型的聚焦, 这里仅将 b 和 k 作为解释变量。

根据 AIC 信息准则和 SBC 准则选择最优滞后阶数, 1960-2016 年的滞后阶数为 5, 1960-1980 年的滞后阶数为 3, 迹统计量和最大特征根统计量表明不存在协整关系, 表 2 为差分后普通最小二乘法 (OLS) 估计结果。

1980-2016 年的数据不是同阶单整, 但其单整阶数最高为 1, 可建立 ARDL 模型:

$$m'_t = c + \lambda_1 m'_{t-1} + \dots + \lambda_i m'_{t-i} + \mu_0 b_t + \mu_1 b_{t-1} + \dots + \mu_j b_{t-j} + \sigma_0 k_t + \sigma_1 k_{t-1} + \dots + \sigma_g k_{t-g} + \varepsilon_t$$

其中, c 为常数项, ε 为误差项, 下标 t 表示时间。 i, j, g 分别对应 m' 、 b 和 k 的滞后阶数, λ, μ, σ 为解释变量系数。根据 AIC 信息准则选择最优滞后阶数, $i = 2, j = 4, g = 2$ 。边界临界值检验的 F 值为 5.1579, 大于 5% 显著水平下的 F 值 4.87, 因此拒绝原假设: 变量间不存在长期稳定关系, 即变量间存在协整关系。

变量间存在协整关系是 ARDL 模型估计长期系数的基础。获得协整系数后, 考虑趋势项并利用自回归分布滞后 - 误差修正模型 (ARDL-ECM) 估计出 m' 、 b 和 k 的短期动态关系, R^2 为 0.9742, D. W. 为 2.1259, 表明不存在序列相关性 (估计结果备索)。表

表 2 差分 OLS 估计结果

	1960-2016 年	1960-1980 年
$D(b)$	-0.3252*** (0.0487)	-0.3107* (0.1093)
$D(k)$	0.7786** (0.0389)	0.8855*** (0.1507)
常数项	-0.0159 (0.0175)	-0.0727** (0.0414)
R^2	0.6737	0.3297
F 值	0.0000	0.0000
D. W.	1.8001	1.9674
观察值	228	84

说明: 括号内数值表示标准误。***、**、* 分别表示在 1%、5%、10% 水平上显著, 下表同。

3 汇报了剩余价值率的长期协整系数和短期动态系数,其中 *TREND* 表示时间趋势项。

误差修正项系数的 *t* 值为 -3.5668 ,在 1% 水平上显著,表明模型有效。长期看(1980–2016 年),剩余价值率与 *b* 负相关,与 *k* 正相关,符合模型预测。短期看,滞后 1 和 2 期的 *b* 不显著,可能是资本家通过转让一部分剩余价值给工人,福利增长使工人提供更多劳动力和劳动强度。短期内,工人收入与资本家占有的剩余价值同步增长,导致剩余价值率变化不明显,到第 3 期时剩余价值率下降。滞后 1 期的 *k* 降低了剩余价值率,这是因为单位劳动使用的资本增加,虽然长期会提高剩余价值率,但短期内增加了资本家成本,反而降低了剩余价值率。因此,不管是战后 SSA、自由主义 SSA 还是整个资本主义长周期,剩余价值率与 *b* 负相关,与 *k* 正相关。

表 3 1980–2016 年美国剩余价值率长期及短期估计

长期协整系数			短期动态系数		
变量	系数	<i>t</i> 值	变量	系数	<i>t</i> 值
<i>b</i>	-0.4791***	-4.8697	$D(y(-1))$	0.2293***	2.6895
<i>k</i>	0.6104***	9.2101	$D(b)$	-0.3675***	-6.6006
常数项	20.1970***	10.3297	$D(b(-1))$	0.1192	1.6555
<i>TREND</i>	0.0305***	5.4330	$D(b(-2))$	0.0315	0.4720
			$D(b(-3))$	-0.1380**	-2.5279
			$D(k)$	0.7665***	19.0669
			$D(k(-1))$	-0.2322***	-3.1620
			$D(TREND)$	0.0056**	2.5698
			误差修正项	-0.1865***	-3.5668

(三)工人组织的重视程度对 SSA 的影响

20 世纪 80 年代前美国剩余价值率的降低与工人对收入分配比例的重视以及工人组织化程度有关。这体现在劳资问题妥协上,尤其是 20 世纪 30 年代资本主义造成社会大萧条后,美国政府提出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并得到 1946 年《充分就业法案》的支持;同时,企业承担维持充分就业的责任,并逐步扩展到医疗保险等其他福利。资方与劳方和谐,其中劳方同意接受社会保障、医疗和其他福利要求以换取劳方最低程度地干预公司盈利(McDonough 等,2010)。工资的协定尤其是以工会组织形式作为与资方谈判的主体,也主要发生在 20 世纪 80 年代前,表 4 给出了美国工资集体谈判历史中具有代表性的事件或法律条文。但 1981 年以里根总统解雇参与罢工的空中交通管制员为标志,资本主义国家对工人联盟采取分离和打压的态度(切尼科夫等,1986)。政

府立法限制工会的罢工权利,限制工会对国会政治捐款,压制工人实际工资增长的要求(Kotz,2009)。因此,20世纪80年代前后劳资关系的转变,验证了模型中 γ 对剩余价值率和SSA的反作用影响。这与一些学者的观点相同:20世纪20至80年代作为美国进入工业后的第3个SSA,以劳动分化和大规模生产为主要特点,工人组织化程度加深,产生了工人阶级对资本家的制衡力量(Gordon等,1982);20世纪80年代后的新自由主义SSA在经济政策由需求管理转向供给管理时产生,此时劳资关系变为资方占统治地位,去工会化和资本全球配置加强了资本家对工人的压迫(Tabb,2010)。

综上所述,剩余价值率 m' 与 b 、 s 、 γ 呈反向变动关系,与 k 呈正向变动,符合图3所示,模型的正确性得到进一步验证。

表4 美国工资集体谈判历史过程

年份	事件或法律条文	主要内容
1919	第一届全国劳资关系会议	劳动联合委员会提出推动集体谈判,协调劳资关系
1927	工会法律地位谈判	劳动联合委员会和律师协会召开会议,明确劳资集体谈判双方应该是工会和雇主组织
1933	工业复兴法	强制规定行业竞争规章须含有保证雇员组织工会和享有集体谈判权力的条款
1935	国家劳资关系法	劳资在集体谈判中地位平等,雇员有权组织、建立、参加劳工组织,有权集体谈判
1938	公平劳工标准法	全国范围内实施最低工资标准
1947	塔夫脱-哈莱特法	注重资方和工会的权利义务对等性,国家劳资关系委员会由5人委员会和总法律顾问办公室分担国际劳工组织推动在雇主、雇主组织同工人组织之间发展与使用集体协议的自愿程序
1949	组织权利和集体谈判公约	规范工会财务等内部事务管理;设立联邦调解调解局;规定国家紧急状态处置程序
1959	兰德勒姆-格兰芬法	允许政府雇员以工会等有组织的形式就雇佣条件、工作环境与政府集体协商
1962	肯尼迪 10988 号总统令	开除 1.1 万人并起诉领导人,工人运动开始处于低潮
1981	空中交通管制员罢工	

七 结论

本文运用劳动力匹配模型,从劳资对抗性关系和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入手,结合美国实际数据,确立剩余价值率作为衡量SSA是否稳定的标准。本文分析了SSA稳定的边界条件,发现从长期趋势看,资本主义SSA都是不稳定的,资本主义发展过程

就是其逐步走向消亡的过程。短期来看,资本主义政府可以在允许工人联盟、提高工人福利和加大资本投入之间实施组合拳,达到 SSA 在某一个时期稳定,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劳资矛盾。但上述做法的代价是以增加失业率和损害工人收入为代价,降低生产力和社会总福利,由于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必然是治标不治本。

(一)资本主义 SSA 的不稳定是历史的必然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100 多年前的《共产党宣言》中预言,资本主义必然灭亡。一些理论者却认为,资本主义不会陷入永久萧条和停滞的状态,它可以通过改变经济和政治政策长时间维持资本积累的最大化。诚然,新 SSA 可以在与旧 SSA 衰退的对抗性关系中诞生,能使经济得到新的增长,但这并不代表资本主义有自我调节的功能。SSA 有生命周期,在制度性调整中扩张,在资本积累中巩固,在劳资矛盾不可调和中崩溃。如果资本家以增加资本和采用新设备来提高剩余价值率,会造成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和社会有效需求不足,商品价值得不到实现;如果资本家通过压低工人工资实现高剩余价值率,则会在激化劳资矛盾的同时导致产出损失,高剩余价值率仍然无法实现,SSA 最终崩溃。因此,SSA 理论虽然解释了资本主义长周期的经济发展和经济危机,但并没有改变传统马克思主义者关于资本主义必将陷入永久萧条的结论。

(二)SSA 的不稳定来自劳资关系的不可调和

资本主义 SSA 通过提供过少的工作岗位来压制工人对工资和收入分配的要求,同时造成资本家产出损失和产能过剩。虽然增加工人福利能通过劳资博弈促使资本家提供更多和更好的工作岗位,但资本家会减少工人的分配比例,不利于形成与社会总产出匹配的总需求。一个可能的办法是允许工人联合起来,重视他们的分配比例。这既能刺激工人努力工作,减少生产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又能增加资本主义 SSA 下的整体社会福利。这也说明,减缓资本主义危机的方法根植于资本主义内部,需要化解劳资关系的矛盾,但最终劳资阶级矛盾是不可调和的。

(三)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是资本主义 SSA 不稳定的根源

如果资本家对工人运动和工人联合既允许又控制,则会因为劳资分配关系的对抗性而不能精确地将其控制在 SSA 稳定的边界,对抗性矛盾终究会突破这个范围;如果资本家求助于资本替代劳动的方法,则会导致社会总需求不足。对抗性劳资分配关系和社会总需求不足只是资本主义制度矛盾的表现形式,它根源于以资本家私人占有生产资料和剥削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社会制度。生产资料和产品分配权归资本家所有以及资本无限追逐利润的目的使对抗性劳资分配关系不可调和,最终导致 SSA 不稳定。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在市场上扮演一个垄断者角色,人为减少岗位供给、压低工人工

资,导致社会购买力和总需求缺乏,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不能实现。因此,只要生产资料私有制不变,资本主义 SSA 只能减缓资本主义矛盾爆发的时间,无法改变生产社会化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最终,资本主义制度将出现总危机,被更先进的社会制度所替代。

参考文献:

- 丁晓钦、鲁春义(2014):《金融化与积累的社会结构转变——基于演化博弈理论的分析》,《学术月刊》第11期。
- 丁晓钦、杨小忠(2016):《经济周期中的资本修复与劳动修复——基于演化博弈的政治经济学分析》,《马克思主义研究》第8期。
- 洪银兴(2005):《〈资本论〉现代解析》,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 马艳、严金强(2015):《论 SSA 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的继承、发展与创新》,《上海财经大学学报》第1期。
- 马丁、沃尔夫森、李静(2004):《社会积累结构理论视野中的新自由主义》,《国外理论动态》第10期。
- 切尼科夫、谭一青、肖勤福(1986):《近年来西方国家阶级斗争的特点与形势》,《理论探讨》第4期。
- Acemoglu, D. "Good Jobs versus Bad Jobs."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2001, 19(19), pp. 1-21.
- Bowles, S.; Gordon, D. M. and Weisskopf, T. E. "Power and Profits: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Accumulation and the Profitability of the Postwar US Economy."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1986, 18(1-2), pp. 132-167.
- Boyer, R. *The Regulation School: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0.
- Freeman, R. B. and Medoff, J. L. "What Do Unions Do." *Indus & Lab. Rel. Rev.* 1984, 38, pp. 244.
- Gordon, D. "Stages of Accumulation and Long Economic Cycles." *Process of The World System*, 1980, 3, pp. 9-45.
- Gordon, D.; Edwards, R. and Reich, M. *Segmented Work, Divided Workers*.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 Gordon, D.; Edwards, R. and Reich, M. "Long Swings and Stages of Capitalism, Social Structures of Accumulati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rowth and Crisis*, 1994, pp. 11-28.
- Keaney, M. "Financializa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of Accumulation Theory." *World Review of Political Economy*, 2014, 5(1), pp. 45-77.
- Klitgaard, K. and Krall, L. "Degrowth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Ecological Economics*, 2012, 84, pp. 247-253.
- Kotz, D.; McDonough, T. and Reich, M. *Social Structures of Accumulati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rowth and Crisis*.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 Kotz, D. "The Financial and Economic Crisis of 2008: A Systemic Crisis of Neoliberal Capitalism."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2009, 41(3), pp. 305-317.
- Lippit, V. D. "Social Structure of Accumulation Theory."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 Its Crises*, 2010, 2, pp. 41-55.
- McDonough, T.; Reich, M. and Kotz, D.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and Its Crises: Social Structure of Accumulation Theory for the 21st Century*.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 O'Hara, P. A. "Recent Changes to the IMF, WTO and SPD: Emerging Global Mode of Regulation or Social Structure of Accumulation for Long Wave Upswing?"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2003, 10(3), pp. 481-519.

Pissarides, C. A. "Short-Run Equilibrium Dynamics of Unemployment, Vacancies and Real Wage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5, 75(4), pp. 676-690.

Reich, P. B. ; Walters, M. B. and Ellsworth, D. S. "From Tropics to Tundra: Global Convergence in Plant Functioning."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997, 94(25), pp. 730-734.

Resnick, S. A. and Wolff, R. D. "Knowledge and Class : A Marxian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1988, 43(4), pp. 851-852.

Sircar, R. "An Introduction to Wavelets and other Filtering Methods in Finance and Economics." *Waves in Random Media*, 2013, 12(3), pp. 399.

Tabb, W. K. "Marxism, Crisis Theory and the Crisis of the Early 21st Century." *Science & Society*, 2010, 74(3), pp. 305-323.

Wolfson, M. H. and Kotz, D. M. "A Reconceptualization of Social Structure of Accumulation Theory." *World Review of Political Economy*, 2010, 1(2), pp. 209-225.

Labor Matching,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Stability in Capitalist Accumulation

Yang Xiaozhong; Ding Xiaoqin

Abstract: The evolution of the capitalist social structure of accumulation (SSA) should consider the labour-capital relationship as the core of study. This paper returns to Marx's classical theory and uses the rate of surplus value as a criterion to judge the stability of the SSA, establishing the inter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come distribution, the rate of surplus value and the SSA under the labour force matching model. In the long run, it is found that SSA capitalism has been unstable and the movement towards capitalist extinction has not changed due to SSA's ability to alleviate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economic depression. This is mainly due to the fact that capitalism's damage to social welfare involves reducing the provision of employment and reducing the proportion of worker distribution ratio and wages.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capitalism, it is necessary to enhance the organizational capacity of workers and adopt collective wage bargaining, which in turn endangers the status of the capitalist system. Therefore, the instability of the SSA emerges from the irreconcilability of the capitalist system's antagonistic labour-capital relationship, which is rooted in the private ownership of the means of production.

Key words: labour force matching, social structure of accumulation (SSA), rate of surplus value (RSV), organic composition of capital (OCC)

JEL codes: J21, J41, J52, P16

(截稿:2019年6月 责任编辑:李元玉 吴海英)